



# 對沙百里文章的回應

史文鴻

沙百里神父這篇有關中國開放現況的論文，目的是要探討中國改革開放、民主問題、人權問題及基督教信仰對中國大陸社會的影響。

無可疑問，就一般的中國文化認識及文化近代歷史的問題上，沙神父的論文表現出很確切的理解，也非常扼要地論述了中國近代政治社會的發展，及其對文化的影響。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紮根，源於中國在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及軍閥的踐踏之下，知識份子要求一種救世靈藥，而標榜科學及社會進化及革命的思想，遂受到知識份子的推崇。不過，對於文革以來，人民及甚至共產黨內上上下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危機的發展，沙神父並沒有作進一

步的解說。在這方面，起碼有兩種說法需要我們分析，一是相信馬克思主義由列寧到斯大林，就一直走上回到共產黨極權之路，且在個人專政的扭曲之下，成爲一種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空殼。（註一）

另一種當然是中共官方的觀點，相信他們仍以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追隨者自居，目的是要首先解放生產力，以建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中國；進而爲了加速經濟發展，他們甚至接受市場經濟，來結合在社會主義政治體制之中，變成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眼前中共的種種社會矛盾，正是源於社會主義體制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不銜接，無論是財產擁有權、利潤分配、政府指令干預與市場

法制和規律之間，都存在著矛盾。

不錯，沙神父掌握到八九年民主運動只是中國社會上知識份子及學生廣泛的要求，而非全國廣大農民群眾的訴求，當然這並非說大城市中的人口對民運沒有支持，他們相對於農民來說，是開放改革中的犧牲者。

無疑，沙神父也了解到中國知識份子及民運人士像中共忠信者一樣，都相信自由不單只是「負面」的（註二），也要實現社會整體的生活理想。不過，什麼是這種整體目標及生活理想，恐怕民運份子也說不清。相反，中共就有它的一套，如社會安定、人民吃飽肚子等論點，成為官方壓制懷有不同政見者時所奉行的金科玉律。沙氏在這問題上引新加坡的家長主義模式來談民主與社會安定的衝突，雖然也有意義，但總不及直接分析中共官方的觀點，來得更直截了當。

對於人權問題，沙氏也比對了西方人權著重個人的基本自主性（autonomy），與中國儒家傳統到

中共官方思想強調集體高於個人的觀點。結果，中共官方思想強調沒有客觀的人權標準，而且，人權也只是內政問題，當然一方面反映中共強調全面行使自己掌握的主權，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共在政治行為方面，沒有給予自己的道德定下底線。

在民主及人權問題上，沙氏只是停留在問題的描述及矛盾的引伸上，並沒有表達出是非對錯和好壞的評價和取捨，使人看不出沙氏有什麼立場及對這些問題有什麼深入的理解，誠屬可惜。

就宗教自由而言，特別是在基督教與中共政權的關係問題上，沙氏也掌握到問題的核心，中共容許的中共官方自由，一定要建立在接受共產黨的官訂體制及指引的框框之內。

沙氏對中共官方領導下發動的宗教研究的新方向，有一定的肯定。這些近期研究的確擺脫了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的框框，不再把宗教看成為人民的鴉片，肯定宗教在脫離了壓迫和剝削的社會關係之後，仍然有存在的意義和功能，這種立場可算是一項進

步。可是，這種研究對改造中共官方意識形態，能起什麼作用呢？這的確很成疑問。當然，天主教和中共之間對中國天主教會的從屬問題，還是最大的絆腳石，對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蒙上一定的陰影。

面對這種境況，沙神父引用唐逸教授所提的三個可能方向：一是中國文化將會基督教化；二是基督教將會中國化；三是基督教和中國文化結合成為一種少數份子的次文化。

當然，人們會普遍相信第二條路向是最合理的。事實上，這也符合梵二以來的精神，公教徒要承認我們不是社會的大多數，也要尊重各種不同文化和宗教，在溝通和共融之中去追尋整體的救贖，但在必要的時候，也要發揮先知的角色。

相信有見識的基督徒都會認同這些大方向。唯一的问题是，我們生長在中國的基督徒，面對一個沒有民主、不講客觀人權原則、由官方意識形態指導和控制宗教活動以符合其政治目標的政權，我們應該有什麼的信念和策略？這點沙氏完全没有提供。

他在展示問題之後，僅僅帶引讀者從正反兩面了解問題，但解決問題的方法則欠奉。

無疑，如何解答這些問題，不單涉及思想方面，也牽涉到策略和實踐的考慮，這亦視乎我們對中共發展形勢的估量。我們大致上可有三種考慮：

（一）中共的改革開放前景愈來愈廣闊，物質進步會帶來政治更開放、法制更完備，我們可以積極配合其發展，與此同時也爭取相應和合理的政治改革和權利伸張。

（二）中共的改革開放會造成不可解決的社會問題，如貧富、權利和地位的懸殊，社會更不穩定，我們只能作最壞的打算，對抗不合理的壓迫，把社會所受的損害減至最低。

（三）中共的發展道路漫長曲折，我們既要團結，又要鬥爭，站穩先知的角色和建設性的批判立場。

無論如何，我們要爭取的，是極力擴闊我們宗教作為市民社會的空間，不應單為符合當權者的意

願而工作，而要重視人道主義、和平與公義，也只有這樣，教會和信仰才能發揮出社會良心和先知的角色。沙氏強調基督宗教文化要和中國文化多加溝通，但中共意識形態和中國文化有多大關連？這是個大問題。當然，我們也不排除教會也要和中共溝通，但一切要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進行，而我們更應該明白我們的原則和信念是什麼，才能立於不敗之地，不致於進退失據。

受某種信念和生活方式。結果，自由的意義在於容許人人在不侵犯和傷害他人的境況下，可尋求實現自己的需求和目的，而國家在這方面要尊重公民的人權。

## 註釋

- 一．這種批評觀點，首先由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帶出，到哈撥·馬庫色(Herbert Marcuse)的「蘇維埃馬克思主義」("Soviet Marxism", N.Y., Vintage, 1961)，發展更為完備。
- 二．負面自由(negative liberty)的觀念，主要來自埃塞亞·柏林(Isaiah Berlin)的理解，強調人類社會的幸福是多元的，沒有人可迫令他人接